

日德关系及中德关系的展开 1933—1945年

田 岛 信 雄

马心丹·李梨 译

- I 塞克特的访华和「合步楼条约」
- II 德中联合的对日战争计划
- III 从第二次日德战争到德中断绝外交
- IV 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德中关系
- V 日德意苏大陆架构想和中国
- VI 从德苏战争到真珠湾

我谈的问题，想从珍珠港事件开始，我认为日德关系的推移，在抵达珍珠港事件为止的国际政治过程中具有何种意义，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中心。

最近我在对日德之间各种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抛开对中德关系的了解来看日德关系或是德国的对日政策的话，是不可能很好理解这个问题的。

但是，就我的观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后的今天，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与对于日中关系，日美关系，或是日英关系的研究比较起来，对中德关系方面的研究却要落后得多，甚至有好多历史事实本身都还缺乏充分的确认。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搞得不够，实际上从世界各国来看，研究发表的课题都很少。

我今天要先把历史倒退回去，从1930年的后半开始谈起。恐怕我谈的部分与其他先生的内容难免有所重复，请给予原谅。

I 塞克特的访华和「合步楼条约」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中关系，我们可以追述到孙中山和鲁登道夫的时代，但在此为方便起见，我们从塞克特将军谈起。

大家都知道，塞克特是德国陆军总司令，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军队的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的人物。当时的德国因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陆军的编制不得超过10万人，而且不得设置参谋部，也不得引进现代化兵器。塞克特把这10万人的军队训练成了后来担负扩大德国国防军中坚的优秀军队。

同时，塞克特在魏玛体制下，还担任了开创新人所众知的德苏秘密军事合作关系的总负责人。就是这位塞克特在蒋介石的要求之下，从1933年到1935年两次访问了中国。在1933年5月至7月的第一次访华中，他向蒋介石提出了意见书，其中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军再编的见解。这份意见书的前提，可以说是以对日战争为主要目标的。在这份意见书中，塞克特根据德国以欧洲战争为前提的军事原理，建议中国建立中央军，以防止地方军阀割据，以及应该把正面战作为中心。

在1934年4月开始的一年间，他再次访问了中国，并带去了法肯豪森将军接任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并与将军共同对军队进行了改编。这个军事顾问团是从1927年开始，在中国进行非正式活动的德国人的一个集团。

我以前曾多次在文献中看到这样的记载，这个军事顾问团是一个常常为饮酒和女人问题争吵的毫无秩序的集团。塞克特和将军把军事法廷制度引进到德国军队，使这个集团逐渐变成了有规矩的队伍。

在德国国内的国防军中推行亲华路线的是国防部长柏龙白，实际上担任国防军第二把手的军务局长莱谢劳中将，担任国防经济参谋部部长，以及全面负责德国国防经济的托马思少将等人。

他们为了发展德中国防经济合作关系，于1934年1月在德国国防军设立了名为「合步楼」的国策公司，并将托马思将军派遣去担任检查官。「合步楼」用中文说的意思是「工业产品贸易公司」，来自于德语的「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

另外，当时担任经济大臣并兼任国立银行总裁的沙赫特也支持国防军的这些活动，后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亲中国派的人物。沙赫特当时在德国被称做「经济的独裁者」，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他当时在推行一个「新计划」。他的新计

划，简而言之，就是为了节省外汇而将外贸改为以物易物的交换，来解决德国极度缺乏的外汇储备。

关于当时的德中贸易，井上先生也指出了这一点，就是说，日德贸易是处于相似状态的，与此相对比，德中之间却是一种互补状态的。既，德中之间的贸易构造基本上是，德国出口武器和工业产品，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是以钨等为主的军需物资，或者大豆，鸡蛋等农产品。因此，中国便成了德国非常适合的合作国。在1936年4月，沙赫特亲自签署了德中借款条约，当时把这个条约也叫做「合步楼」条约，体现了德国国防军以及沙赫特推进亲华政策的一个化时代的阶段。

II 德中联合的对日战争计划

德国国防军为了检查监督这条德中条约的实行情况，向蒋介石政权表示友好，把莱谢劳中将派到了中国。同时，「合步楼」公司和莱谢劳根据这项德中条约，与德国国防军联合制订了一套相当大规模的中国军备扩张计划。这个计划的大概内容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有组织地对中国的军队进行改编。除了德国军事顾问团以外，另外设置了一个顾问团本部，把现役德国军的参谋将校派遣进去，直接隶属于蒋介石。还往经济部门和技术部门也派遣了德国的军人顾问。

第二，在这样的咨询机关的领导下，具体地说是建设由6个师团组成的10万人的中国精锐部队，并在其后扩大强化为30万人的部队。这完全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塞克特重新组建德国国防军的路线为模子在中国进行的翻版。而且他们还计划在6个师团的所属地区分别建立现代化的军需产业集团公司，使每个师团都能达到自给自足。

第三，德国对中国出口紧急军火，首先出口四艘高速鱼雷艇，最终要提供五十艘高速鱼雷艇。还计划提供沿海警备用的口径15公分的炮台，以及水雷封锁设备，甚至还计划提供潜水艇。通过这些装备的提供，使国民党具备了人称“长江可以阻挡住敌人的舰队”。

第四，为了使中国人能够掌握这些现代化兵器，计划让中国的学生到德国学习技术，培养机械技术员。

另一方面，中国方面在接受了这项德中条约之后，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7月开始着手制订「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德国方面与资源委员会的这个三年计划进行合作的，是上述的「合步楼」公司，就是说，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和德国的「新计划」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结合有力地推进了重工业建设，以及军需产业的建设。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资源委员会。它是于1932年11月在翁文灏、钱昌照等高科技人员的领导下，以直属于中国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名义秘密成立的，其后于1935年4月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属下的资源委员会。总之，是隶属于蒋介石之下的高科技集团。

该资源委员会的任务有三：第一，对钨等军事上的战略物资进行调查研究；第二，开采销售钨、铁等矿产资源，以获得外汇；第三，从事重工业的建设。也就是说，中国资源委员会制订的战略方针是，用钨等中国国内出产的战略物资为保障，以此代价来换取军需以及中国的重工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这个三年计划，考虑到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摒弃了已往中国工业发展的沿海地区，而是把重工业建设的计划放到了中国的西南，内陆地区。

在此仅举一例，比如在湖南省建设了中央钢铁厂。这个工厂是由克虏伯公司担任设计监督，西门子担当土木建筑的。说到西门子，在此顺便提一句，最近有个叫做「约翰·拉贝」的纳粹党党员写了一本书，名为「南京的事实」（讲谈社·1997年）已被出版，引起了大家的争议，也有很多论著来评论这本书。我认为，他本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底在南京干了些什么，其实他当时正是在与「合步楼」、翁文灏、钱昌照等资源委员会的密切合作下，全力参与了以日本为战争敌对国为设想的重工业建设工作。

中国军政部工兵署长俞大为在德国的援助下，在湖南省以及其他内陆地区还进一步开办了兵器生产工厂。这些工厂生产的来福枪，其名字从98型的，到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的中正式的，他们还在法本的帮助下，成立了炸药研究所，弹道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等。

当时流传说，大量的德国造兵器通过「合步楼」公司源源不断地流进中国，其种类也从来福枪，到战车，甚至头盔。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1936年末，德国的奔驰汽车制造公司通过法肯豪森在中国首次建立了汽车制造公司，开始生产优质发动机卡车。这些奔驰牌的卡车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被用来运输军需用品，还被用来向山区转移这类军需工业设施。再到后来，又投入到通往缅甸的道路上去。

如上所述，在此阶段，德国国防军，“合步楼”公司，以及中国资源委员会根据德中联合协定所设想的合作计划，其军事色彩是相当浓厚的。他们设想中的敌对国当然是日本。事实上，莱谢劳在中国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一旦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军队并肩奔赴抗日战场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他所示，德中之间在1936年的夏天至秋天，处于这样一种极其密切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之中。这时已经预示着将来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双方有可能发展成为军事同盟国的征兆。

III 从第二次日德战争到德中断绝外交

在此期间，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了。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使用的是从德国的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枪枝，运输使用的是德国奔驰厂技术生产的卡车，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有力军事指导之下与日本进行作战。另外，德国政府还在伪装掩护之下，通过香港向国民党政府输送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关于这一点，在1938年松本重治先生也指出了，“中日战争同时也是日德战争”。正如他所说的，日中战争在初期阶段，带有浓厚的“第二次日德战争”的色彩。

日本方面以“日德防共协定”为借口，将日中战争解释为“防共”的共同行动，但对此德国外交部干部魏茨泽克表示了反驳。他指出：“日本方面把在中国的行动解释为对共产主义的决斗，以此企画用防共协定来把战争正当化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他的这种说法，很难想象是对待同盟国的态度，是非常尖刻的。

而希特勒在此阶段所采取的态度也是非常迟疑不决的。8月16日，希特勒与国防部长柏龙白，以及外交部长牛赖特商量之后表示说：“我从基本上支持与日本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支持防共协定。但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只要中国政府支付外汇或者原料，而且可以伪装得好的话，就一直持续下去，到不能维持为

止。”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下属一直出口下去，只要能巧妙地瞒过日本就行。

后来，日中战争进入了持久战阶段，德国此时采取的措施是“特劳特曼”外交。在此，我不对此加以评述，但有一点想从德国方面角度提及的，就是，此外交的推行者是德国外交部。外交部当时的动机之一，是他们感到很大的压力，担心一旦日中战争拖延太久，或是日本方面取得胜利的话，第三帝国内部的里宾特洛甫等亲日派势力必将扩大，结果势必造成历史悠久的德国外交部从组织上遭到破坏。

而且，事实也是如此，1938年“无对象声明”发表后，“特劳特曼”外交工作收场了，仅在三周之后，德国便更换了外交部长，由牛赖特换成了里宾特洛甫。此人的上任，给德国的远东政策带来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希特勒于2月20日在帝国议会上声明，表示承认满洲国，并于5月12日缔结了德满友好条约，德国政府正式对满洲国给与了承认。

推进情况向前发展的是，在欧洲发生的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中心的“五月危机”。对于此次危机，由于时间的关系，在此不赘述，由于德国瓦解了捷克斯洛伐克而感到有必要牵制英法两国。

在这种情况下，6月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德国撤走了在华的军事顾问团，调回了驻华大使特劳特曼。这等于德国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也是对日的很大程度上的让步。这样，在远东政策的范围内，纳粹党亲日路线得到了基本上的确定。

IV 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德中关系

使这种势力配置发生巨变的，无疑是1939年8月缔结的德苏不可侵犯条约。此条约从中国方面来看，意味着中国过去的同盟国——德国背叛了日本，和中国的同盟国苏联握手言和了。因此，重庆政府特别是以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亲德派，对此条约皆表示拍手称赞。

同时，在德国方面，魏茨泽克副外长也表示了德中苏经济同盟的可能性。在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重庆政府特别是亲德派的政治感情，全都转向了德国方面。

如上所述，朱家骅向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官凯特尔大将发去贺电，歌颂德国

取得的胜利。中国甚至于1940年夏天，派桂永清中将作为陆军武官赴柏林。

在7月20日，蒋介石通过德国的中介，表示愿派遣高官到柏林担任与日本方面的谈判工作。当时的条件至今尚未得以澄清，好像是正式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军队在华北的特权，以此换取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撤出这样一些内容。

但，这个借助德国新秩序的设想，后来由于1940年夏天至秋天在巴特尔·不列颠发生的降服英国的失败，而自然流产了。

V 日德意苏大陆架构想和中国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签署了同盟，松冈外交大臣向蒋介石做工作，希望对中枢部门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德国的里宾特洛甫也乘机而上。此人最近在学术界以推行日德意苏四国大陆架构想的人物之一而闻名，他在此时也希望通过德国的中介，能够使日中战争和解。而且，他开始期待着通过日中的和解，不仅把苏联拉入三国同盟，把重庆政府也拉进来。为此，里宾特洛甫甚至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称，如果重庆政府不加入联盟，德国将不支持重庆政府而改为承认汪兆铭政权。

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时蒋介石政权正好在这个时候，从美国政府接受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并且英国也重新打开了缅甸通道，所以，日本和德国的条件，对于蒋介石来说，完全是难以接受的。

里宾特洛甫推行的这个日德意中苏大陆架构想，希特勒一时也曾表示过兴趣。1940年11月13日，莫洛托夫为参加柏林会谈来到德国时，希特勒对他说过：“中国也有可能加入觉醒了的国家（日德意）的势力范围之中”。

但是，如各位所知，在这次柏林会议上，苏联方面就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等东南欧洲，以及波斯波拉斯·达他内尔斯地区问题，向德国方面提出了十分广泛的膨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要求，从而激怒了希特勒。12月终于放弃了大陆架构想，提出对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开始对苏发动进攻。

VI 从德苏战争到真珠湾

通过德国中介来达到日中和解的动向，到了1941年6月德苏战争开始才完全停止了。至此为止，通过苏联进行的德国和重庆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也几乎完全

停止了。

可是，希特勒认为对苏战争是德国十字军单独的，神圣的战争，所以对日本的要求并不是对苏进攻，而是要求日本南进攻击新加坡，以要挟英国屈服投降。而且，为了促进日本下决心南进，德国于7月1日打出了要承认汪兆铭政权的王牌。

对此，重庆政府终于提出断绝与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大约在此后经过了5个月，在日本发动珍珠湾进攻后的第二天，重庆政府向日德意三国宣布开战，进入了与德国开战的状态。

但是，在此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就是这样德中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中断了。也就是说，德国即使在战争期间也在重庆保留了德国的国策公司「合步楼」。而且，让该公司充当了德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联络工作。这当然是出于德国政府希望在战争停止之后重新与中国交流的愿望而保留下来的。

但是，没有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要求所有的德国人撤出中国，这样，德国人的想法也就很悲惨地破灭了。

[参考文献]

田岛信雄「纳粹外交与“满洲国”」千仓书房1992年

「纳粹的远东战略」讲谈社1997年

「书评约翰·拉贝著《南京的事实》」《中国研究月报》1998年4月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Oxford 1982.

Bernd Martin (Hrsg),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Düsseldorf 1981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1984.

Udo Ratenhof, Die China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1945, Boppard/Rh., 1987

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台北1995年

马振德·威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台北1998年

后 记

本稿原为1997年12月13至14日在日本横滨市召开的第五届近代现代史讨论会（主办单位：近代现代史讨论会执行委员会，后援单位：日本朝日新闻社，神奈川新闻社）上的报告讲稿，题目为「日德关系·中德关系的展开」。此次讨论会的各篇报告以及大会讨论记录，在会后被收录于五百旗头真·北冈伸一编著的「开战和休战——太平洋战争中的国际关系」一书，此次中文翻译的出版已经征得该书出版公司情报文化研究所的许可。

担任此次翻译工作的，是长期以来在我中文学习中给予我帮助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马心丹和李梨二位老师。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另外，本稿的日文原稿因是面向一般读者的讲演稿，所以没有加以精确的注释。在此中文翻译稿准备过程中参照过的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以及日本的资料，均以参考文献的形式登载。

（田岛 信雄—本大学教授）

（马 心丹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李 梨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讲师）

